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九期 ——
(二〇一三年九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9a)

【亲历者说】	一场精心策划导演的戏	
	—— 1966年7月26日的辩论会	李杨杨
【见证历史】	北大1966年7.25 / 26大会印象 / 江青出场	散淡天涯
【研究评论】	破解林彪事件须有相应的逻辑框架	大海之声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十)	孙怒涛
【运动记愧】	陈小鲁的文革道歉信	李立·黄坚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亲历者说】

一场精心策划导演的戏
—— 1966年7月26日的辩论会

• 李杨杨 •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预言“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已在我国兴起！”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晚上8点的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发；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这张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本该做毕业论文的我们又被停止学业。一颗颗年轻的心统统被调动起来，一个个温文尔雅的学子真以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舍出命来参加战斗。

6月18日这一天，我熟悉的校园里突然掀起批斗学术权威和各级领导的狂潮，大饭厅前的三角地、哲学楼前、文史楼前搭起了“斗鬼台”和“斩妖台”，一些失去理智的学生，游斗所谓“黑帮分子”和“学术权威”，按他们下跪，将厕所的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往他们脸上涂墨，

还拳脚相加。亲眼见我尊敬的系领导、热爱的教授被拳打脚踢，被侮辱被损害，我傻眼了，掉泪了，不知所措了。幸亏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及时制止了这场混乱。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有秩序地开展运动。

自“6·18事件”后，学校师生迅速分化，有人主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反对工作组，说他们压制学生运动，有人认为打人骂人不对，支持工作组，有序开展运动。不同观点针锋相对，分歧扩大。传说中央文革十分关心北大事态，江青还亲自光临校园视察。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要来学校听取意见，我和文学专业几位女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三十一位所谓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里是“延安”（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应当使用暴力。我们赞同工作组反对武斗的态度。讨论非常热烈，你一言我一语，尽管相互不认识，很快达成共识。之后，大家推举我起草一份发言稿，我自以为光荣，自以为这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因为我们一致感到，只有站出来表明观点，才是真正支持了中央文革。我还记得，开会时，我拿的是一支铅笔，把大家的话用铅笔粗略记到发言稿上。稿子尚未写成，7月25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便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关于“6·18事件”和要不要工作组、要不要武斗的辩论大会。江青康生口口声声称“要听取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会上不同意见有些议论，但支持“6·18事件”的占压倒多数。

第二天夜晚由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全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各省市的负责宣传的书记又来参加北大的万人大会。由于听说文革小组不支持工作组，我们当然想不通，几个女同学只好借口保护广播站，悻悻地躲开，不参加大会。正呆着，一位女同学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会场上都是一面意见，江青说听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我们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我们一边。呼啦一下大家都跑进东操场。已经10点多了，那里灯火辉煌，群情激昂。我十分兴奋，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我之气概。走上台来，掏出那尚未写完的铅笔字稿纸，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由于一上台就亮明了观点，会场一下安静起来。我抖擞精神，如实地传达了讨论会的看法。我一生中只经历过这一次以我为中心的万人大场面，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终生不会忘。在我讲话的最后几段，几乎是即兴发挥的，每一句话之后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打人、骂人、侮辱人，不是中国青年文明辞典中的词汇。工作组的问题不是延安和西安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讲话有理有节，是非分明，受到空前长久的鼓掌欢迎，因为我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发言结束前，我郑重地念出我所代表的三十一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及她的妹妹张少林。

走上台时，我还感到幸运，这么近距离地见到领袖夫人，江青尽管穿着深绿色军装，却与众不同，风姿绰约。我哪里知道，在我讲的正得意之时，身后坐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们已经如坐针毡，他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我只听到一句“她是谁的孩子？”，似乎是吴德回答的，只听到“长春”二字。在他们看来是时候了，不能让我这样的意见再随便发表了，这个讲话的影响太恶劣了，不仅把刘少奇的“工作组”给美化成一朵花，否定“6·18事件”，还很巧妙地对“文革”表示了微词。我刚走下台来，只见江青腾地站起来，那种表情告诉人们，她已经忍无可忍地等待了半天，她很想打断我讲话、纠正我的发言。但她还是以“领袖”的风度，忍了下来。江青的脸是红中有白，白中有青。在她站起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千万双眼睛看着她。善良的人以为她会以感激的心情表扬、肯定我的发言，没有想到是，由于江青的激动或是愤怒，她的面貌有些扭曲，在我这里那美感荡然无存了。她声音都嘶哑得变了调：“同志们，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接着是红卫兵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央文革万岁！”……此起彼伏的欢呼，使江青的情绪安定下来。这么多的群众拥护，她感到欣慰。她擦了一下眼睛，接着高声喊道：“刚才那个李杨杨，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她这一问，嗓音一高，聪明的革命群众立马心领神会，

于是当即回应：“不需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打倒工作组！”接下来，江青说“工作组”是灭火剂，是消防队，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再接下来，陈伯达表态，强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并附和着说了一些大致相同的话。轮到康生表态，他的话也居然提到我：“刚才有个叫李杨杨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像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像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他们轮番对我这样一个应该毕业但被“文革”强行拦在校门内的大学生的言论进行了逐一批驳，可见我的演讲是有杀伤力的。

接下来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江青居然把康生推到一边，带着哭腔把自己家里的事也抖搂出来：“现在，阶级斗争都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张少华（当时也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张文秋（张少华的母亲——笔者注）是个叛徒……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西来一下，也不知怎么回事，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心脏也不好，我也要控诉！”这时，就听见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后来我才知道，在场的张少华与其妹张少林，在江青刚一提到家事时，就意识到一场残酷的迫害开始了，她们晚到会场，却不得不提前“逃离”。我曾与张少华同室，亲眼见过毛主席与毛岸青、张少华一起的照片，江青有失风度的控诉令我啼笑皆非。

已经是半夜三更了，被点燃的群众烈火烧得更旺，此时，一个小姑娘跳上台来，穿着军装、腰间系皮带，自称是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她针对我的观点又噼里啪啦地作了一番批判。讲完话，取下皮带，当场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和彭佩云，会场上许多群众瞠目结舌，而就在咫尺之遥的江青、陈伯达、康生，视而不见。最后江青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再加上她的创造：“革命的跟我来，不革命的滚蛋！”结束了大会。

第二天，北大校园里大字报千张万张贴出来。到处是中央首长的讲话记录，到处是揭批所谓‘黑工作组’罪行的文章，到处是针对我讲话的批判大字报，到处是揭露张少华一家用心险恶的污蔑造谣。

我这个引出洞的“蛇”，成了“过街的老鼠”，李杨杨的名字很快传遍了全国，各种传言接踵而来。远在东北长春受难的父亲，顾不上女儿的安危，只在电话里说：“在延安，康生迫害我，没想到他的迫害竟能继续到20世纪60年代，迫害我们一家两代人……”

过了很久我才回过味来，这两场大辩论只不过是他们导演的一场戏。正如毛泽东主席自己所说，他在北京放了一把火，然后就躲到南方的“山洞”里，远远地笑看南海的人们为“救火”而如何手忙脚乱。万人“辩论”大会的矛头直指没有看破天机的刘少奇，毛主席不在北京，他主持中央工作，为稳定局势和试图正确引导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与中央其他同志商量，便派了“工作组”。其实，这是一个陷阱，毛泽东回北京后立刻表态“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江青们就是拿着这个尚方宝剑来的。万人大会，为“武斗”火上浇油、煽风点火，企图将文革意识彻底贯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至此“武斗”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呵护下合法化。

北大“6·18事件”成为全社会大规模武斗的开场锣鼓。

我成了一个再无发言权的逍遥派。

（原编者注：本文原题为“青春的记忆”，转载时略有删节）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  
【见证历史】

北大 1966 年 7. 25 / 26 大会印象 / 江青出场

• 散淡天涯 •

1966 年 7 月，在拥护或反对校文革，拥护或反对工作组等问题上，北大教师的观点分歧和对立迅速影响到学生的观点分歧和对立，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辩论闹得热火朝天。“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也经常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

一天下午，江青带着李纳来北大，我们班的几个女生刚好经过三角地，看见她们母女站在一个乒乓球台上，台下围满了学生。江青穿了一身浅灰色套装，身材高挑匀称，李纳站在她身后，伸出双臂娇俏地环着她的腰。我们站在最外围远远地看，听见江青大声向同学们问好，同学们也热情地向她致意。有的还高呼将文革进行到底之类的口号。当时我们觉得江青仪表不凡，态度亲切，因为崇敬毛主席，我们对江青也就有了敬意。

7 月 25 日和 26 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两次集体来北大，在东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辩论会，围绕着文革下一步如何发展、工作组应当去还是留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令大家全都感到震惊意外并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 7 月 25 日晚上江青在主席台上的表现。

开大会时我们全都是席地而坐，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情况。晚上大约 9 点钟左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依序登上了东操场的主席台。康生第一个讲话，主要讲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重大意义”和战略部署。他说中央文革是坚决支持聂元梓，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他的声调抑扬顿挫，带有很浓的山东口音。

最令人震惊和意外的是江青那晚的表演。会开到后半段时，她突然从主席台后排座位上快步走到主席台前，把正在讲话的康生推到一边，对着扩音器大喊大叫“阶级斗争斗到我家里来了！我要控诉！”一下子就把在场的人都搞愣了。

她声嘶力竭地控诉斥责了两个女人，原话的大意可记录为：“张韶华的妈妈张文秋是个政治骗子，她把大女儿嫁给了岸英，又把二女儿趁着岸青发病嫁给了岸青。”“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我们坚决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在我们目瞪口呆的时候，台下有人大声喊“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

然后江青话锋一转又扯到了李纳，她激愤地说：“李纳是个好孩子，去年在顺义四清，你们北大的郝斌和万云（万里的妹妹）一起迫害她。”

江青越说越情绪化了，后来还哭哭啼啼地诉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差，生病治疗非常痛苦，头发都掉光了等等。

相信当时大多数人都感到极为震惊和意外，我的脑子整个都懵了，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江青为什么要在上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说这些非常私密的家务事。我甚至曾认为她神经有毛病。

最后，江青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转回到文革正题，她说毛主席非常想了解运动中的情

况，大家有若问题，可以直接到中南海来反映。最后还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同志们万岁！”

江青声称坚决不予承认的儿媳妇张韶华，以及其妹张韶林当时都在北大读书。这次大会之后，她们姐妹二人就从北大消声匿迹了。

到了7月26日晚上继续开大会的时候，支持工作组的人已经不再有发言权了。康生甚至还厉声宣布张承先执行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大造反派终于“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了。文革运动从此变成了地地道道无组织无领导的群众运动。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  
【研究评论】

破解林彪事件须有相应的逻辑框架

• 大海之声 •

最近看了不少有关破解林彪事件的文章，其观点各异，众说纷纭，甚至对同一件事，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和评价。概括起来，通过对目前已经公开的有关林彪事件史实的“梳理”，基本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流派和观点，一方是：基本否定“林彪集团”的存在，否定林彪有“篡党夺权”和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认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即便林立果和叶群真的策划了谋害毛泽东和准备实施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阴谋，也是背着林彪搞的，林彪对此一无所知，且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因此，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结论必须推倒重来，重新做出结论，还林彪和历史一个公正；另一方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实质上对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他大肆吹捧毛泽东并竭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了很坏的作用，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林彪难咎其责；而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冲突，不过是双方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而已，至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叶群小舰队策划的谋害毛泽东和实施军事政变的阴谋，是确有其事的，林彪也应该是知情的甚至是担纲者。因此，林彪集团是存在的，他们政变夺权的阴谋也是基本事实，林彪的案不能翻。

双方的立论都以公开披露的史实为据，为什么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呢？我以为有如下几种主要因素干扰：其一，因大量的档案资料没有解密和第一当事人的故去，致使林彪事件的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不清，扑朔迷离，许多判断和立论只能以猜测和推理作出；其二，现有的公开史料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一群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因受当事人情感、立场、身份、视野及知情面的局限，这些史料难免在真实性和全面性上大打折扣，甚至相当一部分真伪难辨，自然会影响研究者作出正确全面的判断，甚至起到误导作用；其三，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缺乏历史高度和哲学高度，就事论事，视野偏狭，难免一叶障目，盲人摸象；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由于存在着比较强烈的情感倾向和立场倾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强调一部分对自己观点和结论有利的史料，而淡化甚至隐去另一部分对自己观点、结论不利的史料。总之，由于这几种主要因素的干扰，任何研究者都难免有局限性，区别只在于这种局限性的多少而已。要想把研究的局限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以为，除了尽量占有详尽全面的材料和尽量克服自己的主观倾向之外，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即把林彪事件放到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和哲学高度的逻辑框架中去看，这样可以避免盲人摸象的局限性，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凸显事件真相的整体轮廓。

那么，这个逻辑框架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林彪事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极其深隐，且深得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的传统基因，因而要掌握它的整体轮廓，这个框架非得要四条逻辑框边架构不可，这四条框边即：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人性逻辑；情理逻辑。也就是说，整个林彪事件只有在这四条框边架构起来的罗辑分析中，才会显现出它的庐山真面目。

笔者不揣冒昧，尝试着用林彪事件深远时代背景中的多种历史因素之砖，按上述四条逻辑框边进行“经纬编织”。

第一，中共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政体，如果除去一些时代差别，在政治本质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独裁”政体，而不是毛泽东以后的寡头“威权”政体。也就是说，这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独裁政体”，其合法性和稳定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处于其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君权”的状况。而“君权”的状况，又取决于金字塔顶层——最高权力核心层的状况。文革前中共核心层的状况是：处于最高独裁地位的毛泽东自感已大权旁落，而以自己的副手刘少奇为首的“群臣”以及整个官僚体系，已自成一体，尾大不掉，随时可能取而代之。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除自己面临的权力危机，惟一的办法就是对核心层进行大换血，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大洗牌；

第二，尽管毛泽东强烈的危机感中有诸多猜忌和错觉的成分，但这种危机感也绝非空穴来风。中共的现代专制政体和中国皇权专制政体最大的时代区别之一，就是两者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后者完全可以在血缘关系中合法地传承，前者只有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招牌下才可以获得合法性。而一直以党内正确路线代表自诩的毛泽东则刚刚在“理论路线”上走了麦城，他的“三面红旗”导致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在为他收拾残局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群臣”面前，他的“三面红旗”已经颜面扫地，无以为继，完全丧失了经济建设这个党内工作的主战场。因此，要大换血、大洗牌，谈何容易。仅仅依靠他多年积累起来的领袖权威和个人威望，是远远不够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必须擎起另一杆理论路线的大旗，在党内开辟另一个“主战场”，把经济建设这个主战场挤掉。而这杆理论路线大旗，必须以刘少奇为首并追随其的一线群臣为假想敌，这个新的主战场，也必须为自上而下整个官僚体系的大换血、大洗牌而打造。然而，这样大的动作，几乎是自毁长城，谈何容易！尽管在中国皇权时代也有君主这样做过，比如朱元璋；但那时皇帝本身就有对群臣生杀予夺的大权，朱元璋只需对群臣抓住把柄甚至捏造罪名“杀、杀、杀”即可收到人头滚滚“宿敌尽除”的奇效，但毛泽东不行，他必须大张旗鼓地把这杆理论路线大旗打出来，才可以收到“动员号召全国人民”之奇效。因此，他必须找到一名得力的旗手。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各旗手则非林彪莫属；

第三，毛泽东选中林彪，并非全部因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一番令毛泽东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讲话，还有如下重要原因：其一，在战争年代，尽管林彪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不止一次发生分歧，甚至公开顶撞过毛泽东，但平心而论，林彪在众多中共将领中，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领会得最深刻、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位，因而他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折服，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认为林对他忠诚的主要依据；其二，林彪因长期患病而懒问国事，但每每在党内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却给予毛泽东以鼎力支持。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数顶帽子，说彭“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令毛泽东痛哉快哉，后来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就更不用说了；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彪聪明，对“毛泽东思想”能悉心琢磨，因而有诸多独到领会，且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特别是在宣传、运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面，创意非凡，独辟蹊径，“事半功倍”，且“忠心耿耿”，而这一切，在毛泽东麾下的“群臣”中，惟有林彪才做得到；

第四，尽管林彪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折服，但对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独裁性质也看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对林彪本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把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看得和中国皇帝的个人独裁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林彪压根儿就不相信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中共政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皇权时代的“朝廷”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中共核心层中“高级干部”和毛泽东的关系，在性质上和皇帝与群臣的关系是一样的。正因为林彪对这一点看得异常透彻，所以他才为自己在中共核心层的“政治坐标”进行了可悲的定位。且看他的几条读书“札记”：“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但是，对于毛泽东实行个人独裁的那一套，林彪是否真心拥护呢？非也。特别是建国后，林彪对毛泽东擅权的种种倒行逆施，内心是十分反感、厌恶的，且有自己真实的看法。然而，正因为林对自己进行的可悲的政治定位，令他不得不把真实的想法深深地隐藏起来，长期戴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面具。而这个面具绝对不仅仅是个面具的问题，一旦戴上，林彪就不得不把自己永远地定格在一味阿谀奉迎的“谄臣”的历史坐标上；

第五，然而，正是这种内省性的、强迫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定位，导致林彪的人格发生分裂。也就是说，林彪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党内几乎一致公认，“群臣”之中，惟有彭德怀和林彪敢于公开顶撞毛泽东。然而在老百姓眼中，为什么彭德怀成了“冒死直谏、为民请命”的“忠臣”？而林彪则成了阿谀奉迎、笑里藏刀的“奸臣”？其实，林彪个性孤傲、冷僻、寡言、决断、阴郁、不拘小节，且带有几分不管不顾的直率，除了在文章、讲话和极少数公开场合挖空心思抛出对毛泽东那些“语不惊人誓不休”阿谀奉承之词外，他压根儿就不善于像和珅之类的“谄臣”们那样对“圣上”当面拍马溜须，巧言令色，博取欢心，且能在众多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中上下其手，巧妙周旋，左右逢源。因此，如果用“谄臣”来类比林彪，他是不够这个格的，至少只够半个格。而对林彪而言，要想在君臣关系中玩火，不善当面阿谀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尽管这个缺陷决定了叶群在林叶“夫妻店”中承担了特殊角色，而叶群张扬的个性和圆滑的手腕作为“互补”，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林彪的这个缺陷，但要想完全“解决”林彪的这个缺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林彪正是因为这个“缺陷”而必然地走上了政治绝路。

第六，林彪的“双重人格”，表现在多方面。而其“核心”方面，则表现在对“权力”的得失进退上。人们总在追问，林彪对“毛泽东接班人”这个至高权位，究竟有没有兴趣？他真的想当这个“接班人”吗？他对毛泽东的一味吹捧，他的政治投机和苦心经营，最终目的是否真的是“篡党夺权”，对毛泽东取而代之？其实，如果武断地把这些结论强加在林彪头上，那么显然有失公允有失客观，但在这些问题上一味地为林彪开脱，完全否认这些论断，认为林彪在“权位”面前压根儿就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那同样有失公允有违真相。因为在“权位”面前，林彪委实是一个“两面人”、矛盾体。林彪多年来饱经病痛折磨，苦不堪言，加上他性格孤僻、喜静厌动，对官场博弈权力迷径早已心灰意冷，“敬而远之”，这的确是林彪真实的一面；但林彪决不因此彻底甘于寂寞，只要机遇到来，他仍然经不住权位的诱惑。否则，他就不会悉心揣摩、迎合毛泽东，就不会苦思权谋之术、“为臣之道”。也就是说，林彪时常处于“两个魂儿”轮流值班的矛盾之中：当“病痛难忍、伴君如虎而红尘皆看破”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一推再推，至少一半是真实的；当“有权就有一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另一半推诿，就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了。有人说，林彪的“临肩大任”，几乎每每都是毛泽东强塞给他的，林彪从来没有主动索取。其实，这正是林彪的“驭君之道”。蒋介石对孙中山也用过同样的手法。林彪如果真想在政治舞台上彻底退隐，只需像朱德那样对官场是非彻底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当个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即可，即便“是非”找上门来，便一味地“检讨”，便可自保。而林彪病魔缠身则是更好的借口，又何必如此刻意揣摩“圣心”，迎合“圣意”，且每每在“政治关头”给“君主”以“意外的惊喜”呢？

那么，林彪从事政治投机，是否始终如一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比如，“潇洒”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觊觎于对“圣上”的取而代之？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林彪工于算计，思维敏捷，审时度势时头脑极为清醒。对于自己的所谓政治目标他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到了什么山唱什么歌，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至桥头自然直”，罕有忘乎所以的非份之想。即便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张春桥的发难，也是自保的成分为主，说他急于抢班夺权真是冤枉了他。笔者以为，其时林彪头脑极为清醒，他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毛在党章上许给他的那个承诺已经离他渐行渐远，几近画饼，而不是近在眼前，唾手可得。

第七，林彪沉静专注，运思极深。而他的真实思想总是层层包裹，从不轻易外露。然而，林彪行事还有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具有删繁就简、“直奔主题”的非凡才能。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李文普回忆：林彪爱看书，有时同一本书让他买三四本，划出重要的内容，让内勤剪下来贴到大本上，或制成卡片。买几本《共产党宣言》，看一次剪贴一次，最后剪得只剩几句话。林彪说：就记住“大机器大工业”就行了，得其精粹。砍去繁枝茂叶，直取主干——无论是打仗、读书还是处理日常事务、权力博弈中的“步步紧跟”以及打压政敌的政治斗争，林彪总是能驾轻就熟地拨开繁枝细节，抓准事情的要害。这种旁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非凡才能固然导引林彪每每获得成功，但有时“细节”也能决定成败。当然，对于林彪而言，重要的、关键的细节他很少疏漏，但一个删繁就简的行家，难免会疏漏重要的细节。中共九大党章中关于毛泽东评价的三个副词已被毛泽东本人删去，如此重要的细节偏偏被林彪疏漏了，恰恰是这个细节导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圣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最后翻了船。

第八，对于中国皇权时代的君主独裁而言，君权面临的觊觎和挑战，会来自多个方面：如皇室血亲关系中的手足至亲（在君权的继承上具有合法性）；外戚势力；权力核心层中的文武权臣；藩镇；外族和敌国势力；农民起义。而对建国后的毛泽东而言，他的至高权力面临的挑战，则主要来自他麾下的“权臣”。这是中国皇权政体和中共现代专制政体的重大区别。因此，建国以后，如何驾驭“群臣”，如何防止党的核心层内权臣势力对他毛泽东至高权威的挑战和觊觎，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而毛泽东时代的“君臣关系”有两种状态：一种，核心层的“群臣”一致尊崇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且群臣内部并无明显的派系出现，处于相对团结状态，对毛泽东而言，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反所谓“高饶联盟”，可看作毛泽东为维系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但这种“和谐状态”也有其致命的弊端：如果核心层内部的大部分“群臣”自成一派，尾大不掉，并和“圣上”分庭抗礼，那么“君主”就会“大权旁落”，难以逆转。七千人大会以后，尽管事情远远没有那样严重，但毛泽东自以为“大权旁落”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不得不“挽狂澜于既倒”了。另一种：虽然核心层的“群臣”都尊崇“君主”的权威，但群臣内部出现明显的派系分裂，且彼此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出现这种状况，对于“君主”而言，并不可怕，相反，可以利用两派的矛盾，达到相互制衡、便于驾驭的目的。而群臣分为两派甚至更多派系的最大好处，就是他们不可能联手对付君主。其实，这种君主对群臣派系的制衡之术，中国早有祖传。在中国皇权时代，利用宫内外派系矛盾玩弄制衡之术、使各派之间的权势在相互倾轧中得到有效制约，达到任何一派的势力都不可能坐大到窃取、架空君权的效果，或者任何一派势力都离不开皇帝的支持和调度，这是中国君主们为驾驭群臣、杜绝僭越，保住皇权的惯用伎俩。然而，这套权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玩得转的。或者说，把这套权术玩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皇帝并不多见。这需要有政治洞见，有驾驭才能，有心计，有智谋，还要有足够的资历、声望和威信。同时，对群臣派系的制衡驾驭之术也形同玩火，既然是两派互斗，且双方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那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会绞尽脑汁地反过来试图以驾驭皇帝来打压对方，一旦“君主”着了“反驾驭”的套儿，那么后果极其可悲，轻则在一派对另一派的“凯旋”中大权旁落，形同傀儡，重则连同失败的一方被一锅端，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因此，对毛泽东而言，在对党内两派的制衡、驾驭中，他必须守住两条底线：一条是路线底线，其中任何一派胆敢突破他的路线底线，则彻底翦灭之，绝不留后患；另一条是驾驭底线，即只准手下两派被他所制衡、运动、驾驭，而决不允许任何

一派对他本人进行反运动、反制衡、反驾驭。

第九，中共九大以后，在毛泽东想像中已经“自成一体、尾大不掉”的刘少奇“集团”惨遭“覆灭”，文革中毛泽东依靠的“两杆子”势力充实了中央权力核心层。而“两杆子”之间的齟齬在九大前后已经出现，这还是围绕党内权力再分配刚刚产生的，好在双方基本上“利益均沾”，勉强算得上“皆大欢喜”。然而，在不久的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上，双方的裂痕还能弥合，彼此还能“握手言欢”吗？总之，九大以后，毛泽东麾下“枪杆子”“笔杆子”两派政治势力的形成和对决，已成定局。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两派力量在党的核心权力天平上并不平衡。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枪杆子”在党的核心层坐大，成了毛泽东一块新的最大的心病。他不想让这股势力在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中继续坐大，以防“尾大不掉”，这就是他反复强调在四届人大中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初衷，这也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迅速倒向“笔杆子”一方的主要原因。

第十，在中国的君主独裁体制中，举凡被有为君主驾驭的权力核心层中群臣派系斗争，都是极为险恶的政治漩涡甚至权力陷阱，一旦进入，便成骑虎之势，身不由己，无法解脱。此间，各派的得失荣辱，生死存亡，似两牛角力，悬于抵牾中一寸一厘的攻守进退之中。其后果，则非胜即败，非生即死，非兴即亡，非荣即辱，全身而退者、安然出局者几乎没有。在这个漩涡中，凡被淘汰出局者，下场都极为可悲。因此，一旦双方势均力敌的均衡对峙局面被打破，则各方无不竭尽全力拼死一搏以免出局。这类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已被反复证明。可见，庐山上的一场抵牾虽然事发偶然，但酿成一场生死搏斗却事在必然，林彪作为“枪杆子”一派的担纲者，无论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一旦卷入这个险恶的政治漩涡，就身不由己，势如骑虎，其中大量的“动作”，实质上出于一种政治求生的本能挣扎。

上面几条，只是笔者例举的几条破解林彪事件的逻辑经纬，并不是全部，或许还有更重要的被疏漏掉了。笔者以为，只有各位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找到全部逻辑经纬并有序编织，尤如画家打上方格的画布，则林彪事件中各种扑朔迷离的情节、环节、细节、各类当事者在事件中的位置和作用，才可能在这张画布上有序归位，从而勾勒出林彪事件真相的基本轮廓。

□ 原载《共识网》2013-08-15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8 d，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967.6—1968.9）〕

## 第六节 团四分派根本原因：政治观点分歧和群体利益矛盾

清华“井冈山兵团”已经分成团四两派，由同一个兵团组织内部的两派彻底分裂成两个完全独立互相对立的两个总部。不管是当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还是当今研究清华文革史的专家学者都在分析探究清华两派产生的成因和斗争的实质。

政治观点的分野显然是形成团四两派的重要原因。

我在给《倒下的英才》一书作者唐金鹤的邮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团四最初的观点分歧是在干部问题上。清华师生中认为清华中层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经过文革洗礼应该及早解放的那部分人，慢慢地都集合到4 1 4的大旗下了。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是想善待干部尽快转入‘斗批改’，尽早结束文革动乱这样简单而朴素想法。”

陆小宝曾经评论这是“政治观点决定论”。我承认，几年前我确实认为政治观点的不同是导致两派形成最主要的原因。从兵团总部整风开始，继而在干部问题上展开的大辩论，更延伸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慢慢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凡是同意“红线主导”论的，结成了4 1 4派。反之，凡赞成“彻底砸烂”论者，即为团派。团派与4 1 4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泾渭分明、清晰对立。这是清华派别斗争的显著特点之一。

有意思的是，尽管两派的政治观点分歧巨大而明显，两派却都说自己是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就是说，两派的争论，似乎是两个毛泽东在争吵：一个是文革中的毛泽东，强调的是继续革命理论。一个是文革前的毛泽东，突出的是他的一贯红线。前者以团派作为代言人，后者以4 1 4作为辩护者。

政治观点的不同是造成团四两派的重要原因，对这一点几无异议，所以我在这里不多赘述。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4 1 4的这些人会持有“红线主导”论，而团派的那些人会持有“彻底砸烂”论呢？

经过这几年的思索，我认为团派与4 1 4派是两个在组成成分和利益诉求上有明显差别的群体。

在这里，我要引入“优质生”以及由优质生组成的“优质群体”、“差质生”以及由差质生组成的“差质群体”的概念。

为了说明这两个群体的差别，我以我所在的自6 0 4班作为示例分析它们的成分和形成过程。

我班有36人。入学的时候，有三四位高中就入党的同学马上被组织看中，担任班上和年级里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新生的眼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同学。全班只有一位同学的出身是富农，但因为本人是党员，显然比不是党员的一般工农子弟显得更优秀些。其他所有的同学，尽管各人情况有点差别，但也各有所长，没有明显差劲的。

可以这么说，进校之时，我班的同学几乎全都是优质生。要说差别，也仅是优秀还是优良的程度差别。没有明显的差质生。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已经形成明显的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不是团体）。凡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出身好、成绩优秀的这些优质生，通过高考，送到清华、北大、军工院校及其他一些知名的大学。家庭出身不好的这些差质生，落榜了，个别幸运一点的也只能上不入流的大专。高考，就像是一架甄别“优质生”还是“差质生”的筛选机，把不同的两类人送上不同的人生轨道。能进清华这样名牌大学的，绝大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优质生。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清华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自动控制、无线电、数学力学。这五个新系都是1958年前后新筹建的，其中有不少与国防工业有关的专业涉及保密，因而在招生的时候对考生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严格。总体而言，清华招生时对考生的出身看得不是很重。在电机、水利、土建、动农、精仪、冶金这六个老系里，出身有点问题的比例要高得多。王良

生是水利系的，1962年入学。他说他这个班里，家庭出身成分高、家庭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有海外关系的，竟然高达74%。这与我班（1960年入学）的情况差别巨大。

大学六年中，各种政治运动和繁多的活动从没间断过。拣其重要一点至今还有印象的，有红专辩论、学《毛选》、忆苦思甜、“学雷锋”、评功摆好、学“九评”、农村“四清”、批“三家村”等等。这些运动和活动，基本上以正面教育为主，多数比较温和，偶尔也有点激烈。逐渐地，班上同学分成了两个界线不很分明但是大致有点轮廓的群体：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优质、差质的差别主要在政治表现方面的不同。

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强，阶级感情深等等，都是政治表现好的重要标志。出身于双革（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优质群体的主体，政治辅导员、党员、党支部委员、团支书、班长等学生干部则是其中优秀优质生，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优质群体的核心和中坚。

而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的右派学生是最差质的差质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认识模糊、立场动摇的学生肯定也属于差质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四不清干部家庭的学生，有个性、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不大爱听组织话的学生，都有成为差质生的可能。在政治上表现不上进、不紧跟，以致给组织上留下政治落后印象的，个人品行（譬如有点小偷小摸）、思想意识（譬如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点问题的学生，还有极端散漫、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学生，也可能属于差质群体，虽然这些与政治思想上犯错误有问题是有程度上差别的。

在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之间，有不少既算不上优质生也不算差质生的同学。所以在两个群体之间有一片模糊的中间地带。这两个群体也是动态存在的。本属于优质群体的优质生如果犯了政治错误，就会掉入到差质群体中去。差质群体的差质生，尤其是仅仅因为出身不太好的，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现，积极靠拢组织，能彻底背叛剥削阶级，就会上升到优质群体中去，甚至有可能入党。这叫做“重在表现”。

组织上对优质生的政策是信任、培养、重用。毛泽东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是对优质生说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也是对优质生说的。优质生的前途光明、前景美好。所以，已经处在优质群体中的学生想的是要不断的为党立新功，以确保在优质群体中的位置不断上迁，至少不能往下跌。

组织上对差质生的政策是帮助、团结、教育，使之脱离差质群体，上升成为比较优良的优质生。对于极少数性质严重的差质生就要进行批判、监督、改造，以防再往下滑成为敌对分子。因为差质生都明白自己的前途暗淡、命途多舛，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地抓住机会（特别是政治运动的机会）表现自己，以求挣脱差质群体的苦海，改变差质生的悲惨命运，力求进入优质群体。

这就是当时两个不同群体人的心态。

很显然，优质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是强势群体，而差质群体必然是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

虽然从没有明文公布过优质生差质生的标准，虽然谁也没有给哪个人贴上优质生或差质生的标签，但是组织上（辅导员们、党团干部们）实际上是有有一个潜标准的。他们不断地在给学生摸底排队，进行动态管理。到底是优质生、差质生还是不优不差的中间生，他们的心里很清楚，其实每个学生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在我临近毕业，也就是在文革之前，我班的情况是这样的：

1、党员约有19人，超过全班人数的一半（老系班级的党员就没有这样高的比例了），其中政治辅导员4名。这说明经过大学六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优质群体中优秀优质生的数量明显增加，质量也有极大的提高。

2、有三四名同学因各种原因成了差质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差质群体（老系班级的差质生可能要多一些）。

我在大学前四年一直处于优质群体里的。在“九评”学习后非常不幸地掉到差质群体中，成为班上第一号差质生。

文革前学生中的差质群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1、这个群体比较小。根据我班的情况推算，约占学生总数的10～15%左右（老系里，这个比例可能要高一些）。

2、差质生与优质生之间有矛盾，但表现得不是很尖锐。

3、由差质生上升变成优质生的通道尽管很小，但是没有完全被堵死。所以差质生面前并非漆黑一片，绝望到底。当然，从差质生变成优质生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能成功的几率也很小，而变成更差的差质生的可能性倒是蛮大的。

4、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时候的差质生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差质生散落在各系、各年级、各班中，互不认识，互不联系。所谓差质群体，只是一个概念，并没有抱团形成一个实际的团体。

文革开始了。那场校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的大辩论，本来是会引起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一次大分化大重组的。如果大辩论最后证实校党委是“延安”，蒋南翔姓“马”，那么，保蒋的优质生将更优质，保蒋的差质生也会因为站对了队在转变成优质生的天平上增添了砝码。而反蒋的都犯了立场错误，反蒋的优质生将变成差质生，反蒋的差质生将更差质。当然，如果证实校党委是“西安”，蒋南翔姓“修”，那情况就完全是翻了一个个儿。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当时无论反蒋的还是保蒋的，都是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共产党政权的目的，只是在认定校党委、蒋南翔是不是变修这点上，观点截然相反罢了。不管反蒋还是保蒋，几乎每个人都有让原本优质的更优质，原本差质的变优质的真诚动机。可以想象，要是校党委最后胜利了，那么，其结果就与五七年的反右一样，又将有一大批优质生跌落到差质群体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反基层党委的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实际情况是，这场辩论刚开始没几天，谜底就揭晓了。反蒋反对了，保蒋保错了。于是，这一次立场站对了的反蒋学生扬眉吐气。保蒋的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挨了闷棍，垂头丧气。

工作组进校，反蒋的还来不及受表扬，保蒋的还来不及挨批评，反蒯运动就开始了。这不到十天的保蒋还是反蒋，并没有对优质群体或差质群体的变动产生多大的影响。保蒋的优质生们并没有因为保蒋错了而掉到差质群体中去，反蒋的差质生们也没有因为反蒋对了而上升到优质群体中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保蒋还是反蒋发生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之间的迁动和重组。最多，只是心理上的影响而已。这样的结果，解放以后十七年来还是第一次。

在这场由工作组指挥组织的全校反蒯运动中，反工作组蒯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优质生，而跟随工作组反蒯的主力也是优质生。反蒯运动使得优质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最终，那些

原本是优质生的因为反工作组而成为蒯派全都跌落到差质群体里！

蒯派处境凄惨，一片哀号。蒯大富说：“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陈继芳深夜面对奔流的河水，“一刹那，我想到了死。跳进去么？跳进去就一切都结束了。”蒯大富、陈继芳这些原本是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一下子掉落到差质群体的最底层。如果文革最后以刘少奇的胜利而结束，那么运动后期，这些蒯派全都会定成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命运与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一样的惨。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击的对象，没有一次是能平反的。1950年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的胡风分子、1957年的右派分子、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中的走资派，不管是整对的还是整错的，总体而言，整了就整了，绝不认错，绝不平反。

十七年来，唯有刘少奇派工作组整学生这一次，不到两个月就平反了！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破天荒地由共和国的总理出面平反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毛泽东这个时候突然心生慈悲，换了一副菩萨心肠。但是对蒯派而言，能不能平反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命运就这样出现了戏剧性转变，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反蒯期间及以后的差质群体，有如下特点：

1、差质群体猛然间膨大了许多，全校一下子新增蒯派700多人。

2、以前的差质生是零零落落产生的，情况各异。而蒯派是一次性产生的，全是犯了反工作组这一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蒯派中的大多数都是出身比较好、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斗争精神的原优质生。现在的差质群体中，既有文革前的老差质生，也有蒯派这新差质生。新产生的蒯派成了差质群体中最主要也是最有政治能量的差质生。

3、非常重要的一点，文革前的差质群体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而反蒯以后，蒯大富组织了“井冈山红卫兵”，这实际上是一个以蒯派为核心、为骨干、为主力的全校性的差质群体组织。“井冈山红卫兵”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差质群体的政治诉求，代表差质群体的切身利益。

4、蒯大富平反了，蒯派也平反了。慢慢地，不只是平反，蒯大富和蒯派都成了革命左派，也就是说，成了新优质生。十七年来，有哪一次政治运动中，差质生翻身成为优质生的？没有！一次也没有！这一次，完全是奇迹，是反常。蒯大富不仅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不仅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后来竟然成了实际掌管清华大权的“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差一点成为清华革委会的一把手。蒯大富从反蒯前的优质生，在反蒯中变成最差最差的差质生，反蒯以后成了最顶尖的优质生。这是一个U字形的人生轨迹。他犹如从人间掉入到十八层地狱以后又腾飞到高高的天堂！蒯大富及其蒯派，从工作组反蒯时候的差质群体变成“井冈山兵团”掌权时候的新优质群体。

这个时候，原来的优质群体在反蒯以后，也有如下特点：

1、优质群体向来是最听党的话的。只要跟着党走，永远不会犯错误。但是这一次老黄历不灵了。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反蒯是工作组指挥布置的，优质群体是反蒯的主力军。这一切似乎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没想到，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优质群体紧跟工作组起劲反蒯，最后不仅没立功，反而站错了队，也跟着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随着蒯派成为新优质群体，跟着工作组跑的优质生就不再是优质生了，他们成为相对比较差的差质生了，他们形成了新差质群体。

2、优质群体发生了极大的分化。绝大部分优质生（跟着工作组跑的）整了一小部分优质

生（反工作组的）。最后，这些原本都是优质生的，因为整人和被整，他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落差和情感鸿沟。这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愈合的。

3、优质群体向来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他们前途似锦，光辉灿烂。反蒯运动后，那些跟着工作组跑站错了队的优质生，突然发现他们似锦的前程蒙上了阴影。他们的接班前程被横刀夺爱。因为那些蒯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摇身一变成为坚定的革命左派，成了主流派，成为掌权派，成为新优质群体。

4、在优质群体中，本来最牛气的是革干革军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这次文革的对象就是走资派，所以干部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昨天还是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女，今日成了黑帮子女。他们的身价一落千丈，成了新差质群体中的最差生，被文革运动所边缘。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经落在工农子弟后面。

5、文革前，在校党委、校团委的领导下，优质群体是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的。他们寄生于这一组织系统得以生存，依靠这一组织系统得以发挥作用。蒋南翔一倒台，庞大的组织体系顷刻瓦解，工作组撤走后，优质群体如一盘散沙，只能各自为战。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组织意识仍在，很容易抱团形成新的群体。在批判工作组中诞生的“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那些跟工作组跟得不紧、对反蒯也反得不力的这些原优质生挑头的不自觉集合。

文化大革命所有人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发出了重组和变迁。不仅如此，更严重更长远的影响是，对什么是优质、什么是差质的标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标尺，最基本的方面，如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等等，还是没变。但在文革前后，甚至在文革的不同时段，这一标尺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变化。

在文革初期，凡是能深刻理解继续革命理论的，能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的，能向着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革命造反精神强路线觉悟高的，都是优质生最主要的标志。他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反之，对继续革命理论不理解的，对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的，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开火不猛烈的，缺乏革命造反精神路线觉悟低的，就是保守派，甚至是保皇派，就要沦落为差质生。

文革前的差质群体是隐形的，优质群体是有合法组织的。经过文革初期的激烈变动，有分化，有扩充，有重组，最终形成了两派。以新的标尺来衡量，蒯派成了革命左派，团派成为新优质群体。而原来优质群体中的大多数，这个时候成了新差质生。这一新差质群体的组织形式就是“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们最后演变成4 1 4。

沈如槐在《清华文革纪事》115—118页中记录了几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可以为我的上述分析佐证：

学生干部党员在4 1 4中的占62.6%，在团派中只占27.4%。这说明文革前最优秀的优质生大多数都跑到4 1 4这边去了。

学生中的反工作组分子团派占65.6%，4 1 4占29.3%。“反工作组分子”也就是蒯氏人物。可见蒯派主要集中在团派，蒯派是团派的核心。

反蒋分子团派占60.3%，4 1 4占33%。这说明对旧清华表示不满的绝大多数在团派。

“八九”分子团派占20%，4 1 4占68%。可见保工作组的“八九”分子绝大多数都

跑到4 1 4这边来了。这与多数蒯派跑到团派去了是同一回事。

这几张统计表都是着眼于团派与4 1 4派的成分比例，没有反蒋与保蒋、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八八”与“八九”的比例及人数统计，这是很遗憾的。以我个人的观察，保蒋积极的，一般保工作组也比较积极，一般会参加“八九”，后来成为老四的会比较多。反蒋积极的，一般也是反工作组或者对反蒯保工作组不很积极的，一般会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或“八八”，后来成为老团的会比较多。

群体与观点，这是一物两面的关系。同一群体的人，因为以往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基本相同，所以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观点。反过来也一样，因为政治观点相同或相近，有共同语言，所以彼此接近、吸引，容易共存于同一群体。

“红线主导”论，既是原优质群体的切身感受，也是为肯定原优质群体的过去历史所需要的。所以，“红线主导”论最容易为原优质群体所接受。它是4 1 4最核心、最基础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4 1 4赖以生存的生命原动力。

蒯派切身体验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因此提出“彻底砸烂旧清华”的口号也是非常自然的。唯有如此，蒯派才能避免再退回到过去挨整的地位，保持新优质群体掌权的地位。

学生是清华文革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学生的观点和群体影响着干部队伍和教工队伍，干部和教工必然随之分群分派。

清华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清华牌”的，也就是说，都是优质生留校的。最具典型的是，谭浩强是历次政治运动表现积极突出的政工干部，吕应中是蒋南翔号召走“吕应中道路”的红专典型，罗征启是旧党委的宣传喉舌。没有比“红线主导”这样的理论更得这批“清华牌”干部的欢心了。教职员工中的党员，亮相到4 1 4的占47.4%，亮相到团派的占30.5%。整个清华干部队伍，也是亮相到4 1 4这边的人数要多得多。

简而言之，以原优质群体为主的4 1 4派基本上代表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都拥戴“红线主导”论。而以蒯派为主的团派则代表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受歧视者，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彻底砸烂”论。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既表现在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上，更表现在对今后政治命运和政治前途的争取上。

所以，我认为，团派与4 1 4派是两个不同群体的利益代表。群体利益的矛盾是造成分派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因为“文革不同群众的利益表面上看似是观点与观点的冲突、思潮与思潮的交锋、理论与理论的对峙，而背后无不深藏着广大群众的利益渊源、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

对于分派，除了政治观点和群体属性的主要影响外，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派别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个是政治风险的考量：

历次政治运动让人们明白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政治上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政治上栽了跟斗，人生一辈子就完了。

在保蒋还是反蒋、反蒯还是反工作组这两件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队站错了的人很多。他们心里想着，再也不能站错队了，再也输不起了。团派不仅是多数派，更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主流派、在朝派。4 1 4 不只是少数派，更是被中央首长批评、打压的在野派。这两者强弱分明，前景也大不同。明摆着，参加团派的政治风险几乎没有，参加4 1 4，面临的凶险要大得多。

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的干部和教师，对政治风险的考虑显然要更多一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学生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同学。我班里有一位姓厉的杆儿老团曾这样说过：“4 1 4 垮掉的可能性极大，最好的前景也只能得到清华的半壁江山。蒯大富是毛主席支持的，绝对垮不了，最坏的前景起码还能得到清华的一半江山。清华肯定是以团派为主坐江山的。”他在利弊得失上的透彻分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另一个因素涉及到价值观的认同感：

自从团派掌权以后，团派一些核心人物的价值观取向颇受争议，蒯大富的政治品行也屡遭恶评。许多老四对我说过，他们对团派一些核心人物信奉的“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等等在道德层面有悖于常理的言行非常反感，无法认同。蒯大富在诚信方面的缺损也使他的个人魅力大打折扣。相比较4 1 4这边的头头，看起来似乎要让人放心一些。这也使得受传统教育很深的一部分师生因此而选择了4 1 4。

我认为团四分派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观点分歧、群体利益矛盾、政治风险考量和道德价值差异。至于具体到某个人参加了某派，究竟是哪个方面看得更重一些，哪个因素起的作用更多一些，那是因人而异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可笑的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譬如，看到一个挺讨厌的人参加了这派，心里即使赞同这派的观点也不再参加。当然，这些都是个别的。

## 第七节 两派主要头头的群体属性，我是一个特例

一个人所处的群体与这个人所持有的观点，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致的。

两派的主要头头，有一些我至今都不清楚他们在文革前和工作组时期的表现。我只以比较了解的蒯大富、马小庄、陈继芳、陈育延、沈如槐、陈楚三、汲鹏这几个两派的主要头头来分析它们的群体属性。

团派中，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完全一致的有蒯大富、马小庄、陈继芳。在文革前，他们都是优质生。蒯大富是入党积极分子，离跨进党的的大门只差一个脚后跟。马小庄和陈继芳在文革前就入了党，都是学生干部。这三位都是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在工作组时期，他们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是全校或全系出名的大蒯派。他们是团派总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坚定的团派观点。

4 1 4 中，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完全一致的有沈如槐和陈楚三。他们也都是党员。沈如槐是团支部书记、党小组长，陈楚三是烈士子弟，他们两位也全是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我不是很了解他们在工作组时期的具体表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是蒯派，没挨整。他们对工作组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所以很快成了“八八”派，陈楚三还是“八八”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是4 1 4总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坚定的4 1 4观点（更准确一点说，是4 1 4中的鹰派，坚定的“东方红战团”观点）。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1、这几位在文革前，全部都是出身很好、政治表现优秀的优等优质生。他们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有同样的接班前景。那时他们处以同一群体中，互相之间当然没有什么群体利益的矛盾。

2、工作组时期，他们被分化了。蒯大富等不要说接不了班，而是要当反革命了。沈如槐等仍在优质群体里，未影响前程。

3、“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等成了新优质生，夺取了清华大权。沈如槐等相对于新优质生而言反倒成了新差质生，接班前景渺茫。如不力争，将只能做蒯大富等的臣民。

4、蒯大富是团派一把手，沈如槐是414一把手，其他几位都是派内最有影响力的头头。由这几位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群体归属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在两派的总部委员中，还有不少与他们一样，也是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一致的。

事情总会有例外。有少数头头，他们的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是背离的。

在团派中，陈育延就是一个背离的例子。她出身干部家庭，党员，是优秀的优质生。在工作组时期，不是蒯派，没有跌落成差质生，但也不是坚决跟着工作组反蒯的。后来是“八八”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就是说，到1966年年底以前，陈育延与沈如槐、陈楚三、唐伟等人的经历和状况几乎一样。从她的群体属性讲，陈育延应该归属于414派的。但是陈育延却持有团派观点的，是团派总部核心要员。

在414中，汲鹏也是一个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背离的例子。汲鹏也是党员，是蒯派，与陈继芳同系，各方面情况与陈继芳非常类似。从群体属性上讲，汲鹏本应归属于团派，但他持414观点，是414总部核心委员。

在两派的主要头头中，我是一个最特殊的例子，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背离的程度，超过了陈育延和汲鹏。

两派的主要头头在文革前几乎全都是优质生，唯有我是差质生。一个差质生在文革中敢于跳得那么高，折腾得那么厉害，是极为少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出身好，从中学到大学前几年一直是优质生。优质生的影响和思维让我的胆子比那些出身不好的一直是差质生的同学要大得多。而且，我虽是差质生但不是非常差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太想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了，渴望从差质群体蹦回到优质群体中去。

蒯大富等是在工作组时期才跌入到差质群体中去的。他只跌入过这一次。他成为差质生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几十天。我是在“九评”学习中成为差质生的，已经当了二年的差质生，是老牌的差质生。工作组时期又成了蒯派，在差质群体中往下又跌了一次，成了“双料”的差质生。随着蒯派成为新优质群体，我也跟着沾光成为新优质群体中的一份子。在蒯大富的提携下，成为“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那时的我与蒯大富是属于同一群体同一观点的。

团派是维护从文革前各个时期到文革中反蒯时期的差质生的利益的。从群体利益出发，我应该是团派，而且应该是铁杆团派，一直的团派。

但是，最终，我成了老四，而且是414总部的核心委员。

我与汲鹏都是观点与群体背离的，但我背离得更厉害，因为汲鹏文革前是优质生，而我不是。

为什么我本该属于团派阵营的，反而成为4 1 4阵营的一个头头呢？多年来，我一直这样问自己。

主要的原因，我在群体利益与政治观点之间，我更看重政治观点。我认真比较过“彻底砸烂”论与“红线主导”论的不同，我内心还是赞同“红线主导”论的。一个在“九评”时被“帮助”过的人，怎么不把这当做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迫害、怎么不想着要去彻底砸烂，反而赞同用这样方法对待自己，认为这也是“红线主导”呢？那可能是因为我与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子女还有所不同，也由于清华的政治思想工作那么的强大和有效：整了你，还把你整得心服口服，整得你不怪整人的组织，只怪自己不好。如我，真心地认为“九评”学习中组织的帮助是为我好，而不是迫害我。我始终认为是自己的觉悟不高，认识模糊才导致政治上掉队，才需要帮助。我做梦都想着重返优质群体，变为一个受组织信任的人，并且最终能成为党员。所以我反而认为这也是“红线主导”的一个具体体现。

我之所以在4 1 4这个群体里，更深层次的还有一个原因，我对于不少团派总部委员接受的“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左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等等观点很反感。在价值观和人品方面，我更认同在4 1 4阵营里的那些原先的优质生们。

据我所知，4 1 4头头中，只有我和汲鹏是蒯派，是本该在团派却跑到4 1 4来了。有意思的是，我和汲鹏虽然都在沈如槐为首的4 1 4阵营里，但是与沈如槐等人还是有点距离和差别的。沈如槐、陈楚三都是属于“东方红战团”的，而我与汲鹏都是“三七战团”的。看来，这不是巧合，有一种内在因素在起作用。这里，群体属性还是有不小的影响。我与汲鹏脱离了团派，都赞同4 1 4观点，但是没有完全融入“东方红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观点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是我们成了“三七战团”的人。“三七战团”对团派比较温和，与我和汲鹏等都是与团派同一属性是很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我与汲鹏都曾经“失身”掉入过差质群体，与蒯大富在群体属性上是一致的，这就从群体属性上解释了，为什么沈如槐他们是决不会让我或汲鹏当4 1 4一把手的。这不是沈如槐个人的意愿或好恶，而是沈如槐代表着原优质群体切身利益和集体意志。他们担心我或汲鹏当了4 1 4的一把手，会很容易与群体属性一致的蒯派妥协，会损害原优质群体的利益。

我与汲鹏的群体属性与蒯大富一致，这也从群体属性上解释了，为什么蒯大富对我和汲鹏在态度上要温和一点，没有像对沈如槐他们那么“恨”和“狠”。当然，这与我们在观点上也不如沈如槐他们那么强硬也有很大的关系。

某个人的群体属性与群体归属背离的现象正说明了团四分派并不简单地由群体属性决定的，政治观点会影响一个人本该是在某一群体，但实际上却处于另一群体。

#### 第八节 所谓4 1 4的队伍“纯”，团派的“路线觉悟”高

4 1 4在论战中，除了大力批判团派的极左思潮外，最喜欢拿起“阶级分析”的武器，拿团派的阶级成分说事（我也是其中颇为积极的一员）。4 1 4总是说团派队伍严重不纯，痞子多，有政治问题的多，并为自己这边党员多，学生干部多，阶级成分纯而骄傲。

团派在论战中，除了攻击四一四思潮是右倾的否定文革的思潮以外，也最喜欢说4 1 4的队伍里保蒋的多，保工作组的多，修正主义苗子多，最自豪于自己的造反精神强，路线觉悟最

高。

当年的派战夹杂着严重的派性。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学说，最普遍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是违背中国社会实际的，因而是必须扬弃的。

今天我们应该以新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

蒯派最早反工作组，受工作组迫害最甚，对刘少奇在文革五十天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十七年来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最力。他们瞧不起以原优质生为主的4 1 4在十七年里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最深，在五十天中则成了工作组压迫蒯派的帮凶，最起码也是不敢吭声。

4 1 4当然是不服气的。4 1 4认为在十七年里，在毛泽东思想红线主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这批优质生们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一直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至于在五十天里，蒯派反工作组并不是因为他们路线觉悟高，而是他们自己身上有许多小辫子被工作组抓住了。他们个个都写检查了，投降了，一点也不勇敢，更不是英雄、左派。批判工作组的时候是“八八”带头抗击着“八九”的。总之，蒯派的路线觉悟也不咋的，都是投机投对了的政治暴发户。

这就是所谓的五十天与十七年之争。团派强调的是五十天的路线觉悟，4 1 4强调的是十七年的阶级觉悟。这其实就是“红线主导”论与“彻底砸烂”论激烈争辩的又一反映。

因为五十天的路线觉悟相对是现实表现，十七年的阶级觉悟相对是历史表现，而且当时更看重路线觉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4 1 4落在下风，辩论起来有点理亏心虚。

于是，4 1 4就专攻团派队伍不纯的软肋。

4 1 4里党员、学生干部所占的比例比团派的要高许多，这已经由数据说明了。4 1 4就是以原先的优质生为主体的。这是组织上的纯。

还有一个原因：4 1 4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时候，参加4 1 4的人，都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后，明确表态自己持有4 1 4观点，愿意在组织上脱离兵团总部参加4 1 4的。所以，六七千人的老四，在政治观点上都是赞同4 1 4观点的，对蒯大富都是持no而不是yes的。虽然程度有差别，方向基本一致。这是政治上的纯。

因此，4 1 4队伍就显得相当纯，而团派队伍相形之下就显得不那么纯了。

六七千人的老四坚决“下山”去了，留在“井冈山兵团”的还有八九千人。这其中，有不少同情或赞同4 1 4观点但是不赞成4 1 4组织分裂而留在团派里的。如王良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有好些既不赞成4 1 4观点也不同意团派观点的中间群众，因为无处可去，也留在团派了。还有一些逍遥派，无所谓观点，闲得慌，也偶尔参加一下团派组织的游行之类的活动。有一部分干部，在“再也输不起了”的心态下，参加了政治风险小的团派。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对蒯大富的不少做派也看不惯。只是因为蒯大富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旗帜，从这样的“大局”观出发不愿意公然与蒯大富分裂。在4 1 4分裂前，有一个兵团总部委员曾叫我别搞4 1 4了。他亲口对我说：“老孙，现在老蒯不能倒。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那时老蒯早就变修了，我们第一个就打倒他！”

总之，有好些老团是“被团派”的。也就是说，留在团派的人员，看似庞大，人数超过414，这支队伍，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非414派”。真正持团派观点经常参加团派活动的老团，只是“非414派”中的一部分。现在把“非414派”统称为团派，就给人造成了团派队伍里观点参差不齐的印象。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上述观点上的不纯，最多只是团派队伍在人数上的缩水罢了。譬如说，号称有近万人的团派，“有效团派”实际上也只有八九千人或七八千人，并非比414多得很悬殊。

更严重的是，团派队伍在成分上确实也是不“纯”的。

我已经说过，在文革之前，学生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差质生。只是因为差质生散落在全校各个班级里，没有形成团体，所以差质群体是隐形的。工作组的反蒯斗争，不仅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的新差质生，而且，这个差质群体以“井冈山红卫兵”这样的组织凸显在全校师生的面前。“井冈山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以“井冈山兵团”作为“井冈山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不问出身成分，均可加入。这一政策可能是蒯大富出于招兵买马的需要，也可能是蒯大富自身受过迫害而对同类的同情。不管哪种情况，大量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其中好些都是老差质生），在对比“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执行阶级路线上的差别后都上了“山”，成为“兵团战士”。到三总部合并时“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全校师生员工（除五类分子和没有解放的干部）被囊括进“井冈山兵团”里面了。等到414分裂的时候，这些老差质生，情感上与原优质生要疏远一些，在观点上对“红线主导”论也有一定的抵触，所以他们大多数都留在团派里而没有投奔414。譬如，我的“怒涛”战斗组，他们都是差质生或者接近是差质生，除我之外多数都留在团派了。

在教师队伍中，也有差质教师。在反右运动中犯错误的，在大跃进的时候发过牢骚被组织教育过的，困难时期对党不满的，在中苏论战中因为曾经留过苏对苏联有好感的，家庭出身很差的，对组织顶牛怪话连篇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算作是教师队伍中的差质生。

正因为学生和教师队伍中的差质生比较多地集合在团派里，414用最厉害最拿手的“阶级分析”方法，给团派扣上了“组织不纯”的帽子，团派也是有口难辩。因为，这是事实。

414中，有一些根正苗红自视阶级觉悟高的人，最喜欢攻击团派里痞子多，对痞子口诛笔伐，表现得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团派掌权就是痞子掌权。

我最早知道“痞子”这个名词是在学《毛选》的时候，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读到的，乡绅蔑称贫农叫“痞子”。

尽管毛泽东为“痞子”正了名、平了反，说他们是“革命先锋”。但是“痞子”这一称谓实在太不雅了，没人自称痞子或喜欢别人叫自己是痞子的。

在两派争斗中，414口里说的痞子究竟是哪些人，好像没明确地界定过。我的感觉，言语举止有点痞气的那些人，大家往往叫他们痞子（有些是不带恶意的调侃味道）。但是，痞子绝不仅仅是指他们。家庭出身不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差的，旧社会过来有历史问题的，其他劣迹斑斑的，都属于痞子的范畴。痞子，主要所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

“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

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写得极其精彩生动。把从未跌入过差质群体的优质生比作绅士，把老差质生和曾经跌入过差质群体的前优质生比作贫农，当然是极不合适的。但是，农民运动时绅士们的心态与现在这些老优质生的心态，倒是惟妙惟肖地相似。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差质生比优质生矮人一等，没有多少发言权，抬不起头来，更别提什么接革命的班、掌革命的权了。而到了1967年上半年，过去的差质生们摇身一变，混迹于新优质群体里，俨然成了掌握清华大权、接革命班的新优质生。而原来的优质生身不由己地成了相对保守、右倾的新差质生，本来名正言顺的革命接班也成了泡影。这种身份的变化、地位的变化、前程的变化，是向来居高临下的老优质生们所没法接受、口不服心更不服的。

蒯大富、陈继芳等蒯派，原来就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与沈如槐、陈楚三等都是同属于优质群体的。这些在工作组时期当了几十天短暂差质生而今成为新的优质生，成为掌权者，414中的老优质生们对他们的掌权是无法指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革命接班人行列的。对于他们的掌权，最多仅仅是对他们的个人品行有点微词（如对蒯大富）。所以，414所说的痞子，并不是指他们这些人。

414所说的痞子，主要是指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老差质生。痞子，就是对这类人的蔑称。因为蒯派掌权，老差质生又多跑到团派里来了。所以，团派（蒯派）掌权，也就是这些痞子得利、痞子翻身、痞子掌权了。

纵观两派头头，就我所知，老牌的差质生就我一个。我如果一直在团派总部，很可能，我就是最易被414攻击的痞子掌权的典型。

我参加414以后，也曾在大礼堂的讲台上用派性的“阶级分析法”为414卖力地鼓噪过。只是，我在文章中、讲演中，竭力避开“痞子”这一称谓，因为我心虚。我心里既否认自己是真痞子，又怀疑在别人眼里我就是痞子。我对“痞子”称谓有一种过敏的回避。

沈如槐、陈楚三等414头头和群众对我一直都是很尊重的。但是每当414批判团派痞子掌权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

看过我的回忆录初稿的许多朋友都说，当年无论老团老四，谁都不认为你老孙是痞子，这痞子是你自己臆想的，痞子的帽子是你自己戴上去的。确实，我身上并没有痞气，相反，留给大家的是谦和、讲理等不错印象。但是，“痞子掌权”中的“痞”，并非只是形象谈吐上的“痞”，而是政治上的“痞”。

我想起我班的那些党员、辅导员等，他们太了解我了。像我这样政治上一贯认识模糊，是他们曾经帮助的对象，现在成了总部委员，成了他们的领导，他们嘴上不说，心里能服气吗？不管我是团派的总部委员，还是414的总部委员，就我现在成了总部委员这级别的“领导”，仅此一点，他们心里也是难以服气的，心态上的不平是可以想见的。我这样说，并非瞎猜，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毕业的时候，班上那些过去的优质生们，不管是老团老四，他们共同给我做了一个让我欲哭无泪的毕业鉴定。我在他们的眼里，依然是政治上的痞子。当然，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运动记愧】

陈小鲁的文革道歉信

• 李立 • 黄坚 •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 李立）8月21日报道——

今日上午，一篇自诉对北京八中老领导和老师们进行道歉的“文革道歉信”广为流传，落款人为陈小鲁。下午早些时候，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处秘书长（陈小鲁任会长）黄坚向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证实，道歉信确为陈小鲁所发，不过最开始是通过邮件回复黄坚本人，黄坚受其委托将该道歉信贴于该会博客上。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对黄坚进行了采访。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是陈小鲁发的吗？

黄坚：是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份公开道歉信。陈小鲁的初衷，是在我们北京八中同学会内部向当时的校领导道歉，我们十月份打算开同学会，请来尚健在的老师和校领导，这个道歉是针对同学会的。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出来？

黄坚：陈小鲁的道歉起源于我贴出的几张照片，照片记录了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校长、书记、主任）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不堪回首的屈辱时刻。作为老三届学生，我感觉这段时间民间要求反思文革的呼声很高，不久前我也收到朋友寄来的北京育才中学一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文章总结：如果我们现在不道歉就来不及了。对此我感触很深，所以选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8月18号将照片贴出来，这个日子是一个文革标志。我想在这一天真诚地向老师们道歉。同时，我也用邮件转发了一份给陈小鲁，不久就收到他这封道歉信，算是对我发出照片的一个回应。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照片怎么得来的？

黄坚：从同学家里翻拍的，当时有些同学拍了些照片，留到了现在。发出照片当天很多同学给我打电话，包括陈小鲁在内都感到震惊和不堪回首。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为什么陈小鲁觉得自己有责任？

黄坚：他觉得自己在学校造反运动中是校革委会主任，算是个领导，自己没能阻止学校领导、老师受到迫害，自己有责任。虽然现在道歉有些迟，但他想代表大家站出来反思文革，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

当然，他道歉并不代表他打过人，当时他没打过人，就像我发照片时写的，虽然当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就是黑帮就该劳改就该挨揍，但是我们全都无可挽救的成为“文革”的坚决拥护者。所以我们要反省文革。话说回来，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八中各班有各班的事，斗黑帮运动最开始是斗校领导，后来就连老师也无一幸免，学生打老师，他也阻止不了。

他敢去阻止吗？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中，陈小鲁询问同学是否愿意让他做代表道歉，同学们同意吗？

黄坚：北京八中老三届的学生有1000多人，现在我们联系上的有700多人，这700多人大部分是认可陈小鲁代表大家向老师们道歉的，有少部分人反对，但这是极少数。陈小鲁站出来道歉，就像当年德国战败后，德国总理下跪向犹太人道歉，总理没迫害过犹太人，但当年被迫害的人需要一份道歉，社会需要当事人道歉给予精神抚慰，现在已经没办法指认当时的打人者，陈小鲁高姿态站出来，我们是认可的。当年为了整教育界的走资派，学生被鼓动起来斗黑帮，斗校领导、老师。现在是时候对这些事进行反思了，我们不能让文革回潮。现在有些言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反思文革才出现的。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你指哪些言论？

黄坚：我在博客上发出那组照片后，有人留言说，现在的校长和小学生开房，老师强奸幼女，这些人就应该打死。这就是文革的回潮。任何时代都有好老师和坏老师，即便遇到了坏老师，也不应该由学生把老师扭送游街，现代文明有法律，评判是司法机关的事。文革当时就没了法律，包括国家主席都没有法律保护，更何况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一个同学，上完初中说下学期不用上高中了，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批斗老师，后来上山下乡才追悔莫及。所以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不希望看到文革回潮，不希望年轻人做出同样的事，解决问题不能靠泄愤、暴力等非法手段。所以我就要在8月18号这天发文革照片，我们要道歉，从我做起，反省文革。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这件事本来是内部事件，现在公开化了。

黄坚：我们现在如果不道歉，就太晚了，为了让社会反省文革，正视它。

附：陈小鲁道歉信原文：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

□ 原载：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